

## 米国均<sup>①</sup>

地点：北京东交民巷

时间：1995年2月14日



米国均

钟：米老，希望您能介绍一下您当年赴日本留学的所见所闻。

米：我是东北人，辽宁省的。我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正好是张学良换帜，换成青天白日旗，也换教科书，我们开始学习三民主义、孙中山全书等，也有中国历史课。1931年“九一八”日本占领中国东北时，我正在盖平县西关中学上初中。盖平在沈阳南边，距离有300里地。“九一八”那天早上，给我印象很深。我每天一早上课由县城走路去西关，有5里路。早上7点30分，学校开早会，教导主任宣布说：

<sup>①</sup>米国均，辽宁盖平人。1935年赴日本留学，进东京工业大学，1942年9月回国。197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日临时代办。

“昨天夜间，沈阳来电话说，日本军队把沈阳北大营占领了。可能我们县的日本军队也会来占领，学校可能要停课，大家要准备，先回家等待。”这时候，就已经发现日本军队从西边火车站往这边运动。我们西边山峰上有一个警察大队，原是讨伐土匪用的，他们在等待县政府命令。实际上张学良政府已经瘫痪了，而那些所谓日本军队，实际上是日本侨民，换上军衣拿上枪，就是了。警察部队看日本军队快逼近了，就往东边山区跑了。东边是山区，是土匪隐蔽的地方。我们放学回家，西关城门近，但已经关闭了。我们几个同学绕到东关，城墙上已经是日本军队一个小队占领了，枪对着我们，对着城里面。我记得很清楚，五六个日本军人端着枪，对着我们，我们战战兢兢地从枪口下走过去。这样给我们的印象是日本人太狠了。那些兵叫预备役，一穿上军装就是兵。

我们中国学历史，过去一段时间基本不重视，改革开放后好多了。我们过去靠历史教育，我的中学历史教师是不错的，他姓吕，我在小学就喜欢历史、数学和英文这三门课。我当时这样从枪口下走过去，又认为三民主义能够救中国，所以对帝国主义非常厌恶和仇恨，非常希望国家能够统一，好打日本侵略者。

钟：那么，“九一八”当天早上，日本军队就占领到沈阳以外300里的小县城了？

米：铁路什么的，早就被他们控制了，他们的人穿上军装就是日本军队。东北很快被日本占领，丹东东边道及安东附近山区里有了抗日游击队，有邓铁梅的游击队，我们都寄以希望，但后来被日本军消灭了。那时北满有马占山，还有抗日联军，但多是旧军队改组成立的。邓铁梅就是原安东凤凰城旧警察局长出身。他们的抗日是一种爱国行为，但没有系统战略。

我的舅父是在张学良的沈阳兵工厂工作，他回家总是讲兵器。我就想，要救国就要学兵器。后来我们县中一直没有开学，没办法，我就到营口师范附中，插初中二年级，念半年，家中经济不富裕，没有钱，没有办法，我又回到县里考省的第三高级师范，考上了就吃、住、学费全是公费。我为了省钱就去考试，用同等学历考上了。学到第二年，就是1933年，学校搬家到海城，即张学良家乡办的原男子同泽中学，非常漂亮的地方，设备比较近代化，有钢丝床、暖气等设备。我还是喜欢历史、数学、英文，用的教材也还是原教材。到海城就全改了，凡是帝国主义的东西全加上了，还加一个日文。日文老师最初半年是一个中国人，后来换成日本人，是一个日本农民没了职业，失了业来当中学老师，他就有饭吃了。这个人贼横贼横的，不得了。我因为特别仇视日本人，就不愿意学日本文，在日文课上我看别的书，那位老师就打我两个嘴巴子。

钟：就这样教学？

米：唉，就这样。所以我并没有学好日文。1935年7月我毕业了，18岁了，就要找工作。家里希望我当教员，或者搞小买卖以赚钱。我当时考虑出路，去华北不行，那儿已经成立伪华北政权。当时我们还没有身份证，只有一份毕业证明书，当时也开始有户口了。我们四五个同学商量去向，有一位姓秦的同学，他家有錢，他建议我们一起去日本留学，当时东北伪满也没有大学可上。我们在7月商量好了，8月份就坐火车集中到沈阳，第二天我们5个人，到车站附近的日本总领事馆去办手续，拿出毕业证书给他们看。接待的是日本人，说中国话，他表示欢迎年轻知识分子去日本，拿张表叫我们填写愿意去日本，第二天就批准了。

我们买了火车联票，从沈阳经朝鲜到釜山，直达快车，基



东京银座街头 (1930年)

本全是日本人经营。从新义州到丹东，名义叫伪满铁路。到朝鲜是另一段，有人上来检查乘客，用一个小时。再过鸭绿江铁桥，一昼夜到釜山。码头有一条下关——釜山的联络船，我们下车就上船。一早到日本门司，海关来检查，我带的东北大柳条包给查了一阵子。然后上岸乘火车，好像叫“鹿”号特快，一直到东京。

我们是小地方去的，表面看日本是繁荣。我到东京，先到学生寮去，在牛町。我去那儿是找一位老乡，他叫何正卓，身份是伪满的海军军官，正在日本海军学校读书。他就介绍我住进学生寮。后来知道何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一直没有回来，后来我同他没联系，但听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死得很惨。我听了他的死讯很难过，他只跟我一面之识，他帮了我的大忙。

住下之后，就分头找住处。我找到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鹤卷町，那是小市民住区，比贫民窟好不了多少，多是旧木板房。我的房东叫细田穰，是个木匠，房子楼下是房东夫妻和一个小孩子，楼上朝阳面是一个搞保险业的推销员，朝北的房间有3叠大，归我住。我还在他家一天吃3顿饭，一共收我9元钱一个月。我是求能吃饱就行。房东老太太缝衣服，挣点手工钱，顺便在门口摆个小摊。每天早上都有米饭吃，再一碗大酱汤和一点咸菜；中午装个饭盒，米饭上有一颗酸梅，给我带到学校去吃；晚上还有一点小烤鱼给我吃。

我是立志要学工业，为考学就要先补习日语、数学和物理。我是1935年8月27日到达东京，立即去神保町的东亚日语学校报名，9月就开学。我一去就到中级班上课，学了3个月，有点基础了，我又去水道桥一家研数学馆，私人补习数学和物理。总之我一天到晚地上课学习。我的日语补习了半年，同时也靠在房东家中学习。有一次我发烧到38度，没有钱治病，房东和

他姐来看护我，没有药吃，只有用冰袋放在我额头上，一天24小时地看护，所以我很受感动。后来我准备考试，晚上复习功课要到半夜12点钟，第二天一早6点钟又起床上学去，房东对我说：“你这么累，身体要吃不消的。我买不起猪肉给你吃，这样吧，我买兔子肉给你吃。”就这样，他们每天晚上专门给我做兔子肉吃。他们很尊重文化，同情穷人。我是只能在星期天复习功课时，帮他们看一下小摊子，他们完全拿我当家里人看待。

我隔壁的那位房客实际是1933年日本经济大恐慌之后失业的，他的房间有6叠大，他是靠当东西过日子。他叫松永。有一天他问我：“先生，你是不是有钱，可以借给我？”我当时手头很紧，我就说：“我没有钱，房东有钱。”房东在楼下听见了，等他出去了，就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要借给他。他已经长久失业了，他现在就剩下西服没有卖了，别的他全没有了。借给他钱就还不了，你又是穷学生，借给他你就没有了。”这人经常早饭也不吃，就是睡觉，白天出去转一圈，晚上回来也不吃晚饭。房东说这种人很多，在经济萧条中失业的人很多，流落街头。4个月以后，这房客连房租也交不起了，就没有再见面了。从这个人可以看到当时日本经济问题。世界经济大恐慌一般在1933年好转，但在日本又拖后几年在1937年用侵华战争过去的。

我的住地周围多是做小买卖的，他们生活也不宽裕。过新年，大家玩日本纸牌（卡卢达）。我渐渐对日本下层民众生活熟悉了，过新年时，我们去逛浅草寺。房东的一个小姨子、对门一个女孩，房东小孩和我，大家一起去，一个人拉住一个人的后衣带，成串而行，要不很容易就挤丢了，回不了家。我们先坐车到浅草，说是在那里，大年三十时作祈祷最灵了，只要在神殿门口，扔上几个小钱，把那根绳子一摇，绳上的铃儿就丁当乱响，把手拍三下，跪下来祈祷，头朝下，嘴里说自己的愿

望，就可以了。要想再进一步，就可以讨个签，预测一下。第二天，大年初一，东京人有逛明治神宫的，是正式祈祷。日本一般穷人是不去的，理由是因为管穷富的是浅草那样的神，明治神宫是不管的。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日语，那时是下町腔，是劳动人民的话。1989年我去香港，见到日本人，他们很奇怪我的发音为什么是日本江户上层腔调。因为我后来在疗养院住过，又全是上层社会的山首语，地道的东京腔了。

1935年秋季，是中国人去日留学的高潮，东京神田区神保町一带，下课时全是中国学生。那时郭沫若每月来青年会馆讲演一次，我偷偷去听了一次，他是讲通俗理论。还有日本的秋田雨雀教授也来讲过。东京有一个筑地小剧场，演近代戏剧，对门是演歌舞伎古典剧的地方。筑地小剧场经常上演俄国戏，中国学生去看的人不少，我很穷，省一顿饭钱去看过一次，很有印象。我也离不开神保町的旧书店，常常去看书，后来也买马列主义的书。

我正赶上日本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那天我照样6点钟起床，6点半正吃早饭，收音机广播了，说今天凌晨军人袭击首相官邸，把滨田首相打死了，首相老婆也受伤了，大藏大臣高桥也被打死了，内务大臣斋藤也打死了，陆军教育总监渡边也被打死等等。我听了吃一惊，那天又下大雪，我还是去上学，因雪大电车不通了，路上人很多，我没乘公共汽车，经过九段路，看见宪兵在戒严，路上行人指点议论，说是青年将校皇道派聚集3个联队，去袭击内阁大臣家。我从九段转向神保一线还是可以走。晚上回去，房东也讲这事。27日早上又广播通知，说天皇将之定为反叛部队，要士兵回营房。29日反叛者们开始缴械，一批人很快被枪毙了。此事现在看实际上是日本准备出兵中国的措施，听说北一辉是法西斯思想主导者，也被枪决，真

正主导者是陆军大臣荒木贞夫。

我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日本学习，觉得这个社会不公平，又很想家，又没有钱，生活很苦。有时听听收音机播的音乐，当时开始播送的歌曲，像爱情歌啦、儿童歌啦、民谣啦，我印象很深。也有触景生情的掉眼泪的歌曲，像林富美子的“旅愁”，我也学着唱；还有一首“乡愁”，这是日本人出外想家之歌曲，很有名的。后来到1936年下半年我在上大学之后，社会流行歌曲也变了，军歌多了。日本军歌也是从樱花开始吟诵，樱花很表现日本人性格，它开花的时间很短，但开花时很招人喜欢，也就想到人生有如樱花一样，这是日本社会的一种特点。从前我在家里爱吹笛子、吹箫、拉胡琴，我也把乐器都带到日本去了。后来我把乐器全放弃了，原因是我有一个同班的好同学，他是国民党员，我思想左倾，他对我说：“老米呀，你思想挺进步，怎么喜欢这些封建的东西？”我当时年轻好胜，一气之下就全抛掉了。我们两人是对立面，又是好朋友，有时间还一起去看电影，能省出点钱就去看，多是法国的、俄国的名著。

我在1936年报名考东京工业大学，第二志愿报考商科大学。我是到伪满使馆报名的，别的同学问我说：“你怎么同时报考这两所大学？”我回答说：“我是破釜沉舟呀。”这两所大学都是名牌大学，不要学费，如果考上就好了，如考不上，我就来年再考。别的同学就议论说，他是东北来的，又穷又死心眼儿，文化程度也低，我们从上海来的还不敢报考呢。当时东工大有预科，平均17个人中取一个人。我报考的是染料化学专业，为什么报染料化学？说也可笑，我认为是学习制造火药的。等到3月4日考试，6日公布录取名单，我一看栏上面有我的名字，我高兴地回来了，房东也祝贺我考上了。我是等于初中没有念，从师范出来的，居然考上了。我也就马上搬到工大附近的大冈



山去住。

学校是在东京大地震之后重建的，是建筑系教授谷口设计的重建方案，自己吹嘘可以经受6级大地震，即使地翻个儿，房子也翻个儿，也不怕。现在保存得不错。当时东京工大，称为日本的麻省理工学院，服装和帝国大学一样，领口上有个“T”字。当时主要学科有12个，学机械的人多，学化学的人少，染料化学科才10几个人，三年学完毕业。我在第一年不拿伪满州国的奖学金，所以生活很困难。后来又是我的那位国民党好朋友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拿钱？不拿白不拿，你将来做什么同拿钱没有关系，他那里是普遍给的。”第二年我才拿钱，当时预科一个月40元，理工科45元，本科65元，这样我的钱就够用了。

我搬到大冈山的新居，是属于中产阶层范围，男的房东在银行做部门主任，女的是社会活动分子，大儿子与我同岁，二儿是中学生，还有个小女儿。房子是平房，有个小院子。他们把北头那间6叠大的房子给我住，管早饭，房租很低。住进去的第三天，房东同我说：“你是在东京工业大学，我的大儿子在武藏野高工，他可以到你屋里学习，取得你的帮助。”结果他儿子就搬进来了，慢慢就一同住了，6叠大住两个人。那位是个花花公子，不怎么学习，我得帮他学数学，所以算我房租便宜有道理的。有时这位公子想出去活动活动，房东开始不让，然后就叫我陪着，说：“有米先生陪着没有错。”这公子有时竟带我上他女朋友那儿去，我也得陪着他。星期天，他说要上教堂去，我说你信教不信教？他说是去看女的。反正他是要拉上我，就好似合法的了。二公子叫横山宏，当时念中学三年级，他的国语（日语）让我补习。

钟：补习日语？

米：是的，补习日语。星期天，还叫我带那位十一二岁的

小女儿上公园去玩耍。简直是当保姆，所以房租那么便宜。大儿子补数学，二儿子补日语，小女儿带去公园，完全一个保姆。不过，学习环境不错。

当时那些伪满的高干子弟，一去日本，军方就喂“蜂王浆”，专门培养他们当官僚。在1939年，要是伪满学生会馆里有聚会，才能见到这种人；还有一种是家里有钱，到日本是醉生梦死地混日子。再一种就是穷学生，人很少，整天埋头读书，生活清贫，精神上也安定。我在学校时，学工业制图课，班上同学大都出去玩，他们学图大部分归我画，星期天同学们多是上街去了，我因为没有钱去，就画图。最后他们全是甲等，我则是乙等，因为我最后画，太累了。学校里没有多少教材，学习全靠笔记，一般上课很随便，我是有课就听，并且认真记笔记，到考试时有些日本同学就来借我的笔记去抄。老师多是从东京大学来兼课，水准不低，他们也常兼大公司的职，掌握许多新的实际资料。有的还去德国留过学，系主任是有名的林茂助教授，搞石油的研究。1973年我到东京时曾拜访过他，当年已93岁了。管教染料合成的是上野教授。合成好像是中间体，往不同方向都能发展。

我陆续买了大量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家里不敢存放，当时学校里每人有一个体育用柜，特务也查不到，我就把书藏在那里。有一年换年级，我没有去换柜子，结果就有升班的人来换我的柜子，打开见是一大堆书，没办法，就拿到我的数学老师那里了，现在在中日友协的孙平化，当时和我同学，他发现了，就跑来告诉我说：“老米，坏了，我们的柜子被人撬了，等着被逮捕吧！”我说：“不能，你别着急，我去找老师。”然后我去对老师说：“我有一些书，听说在您这里？”他说：“你快拿走吧。乱七八糟的，在那儿堆着呢。”我就把书抱回来。数学老

师痛快，结果是有惊无险。在40年代的日本，有关马列的书是在日本书店买的，但你中国人看，就是违法行为。好处呢，我们学校有个图书馆，一人一个座，一个台灯，我常在馆里看书，同学谁也不管谁。马列的书我基本全在那里看的《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资本论》，我全看了。特别是1938年春在苏联出版的《联共党史》，冬天我就看到了。是一个同学告诉我的，书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里，我就求他带我去看，用一个假学生证，我用两天时间全看了，如饥似渴呀。我原是英文的底子，学了日文，化工要用德文。我还学了点俄文。因为日本翻译俄文，像“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词不能写，就是×××，我就得学俄文才能搞明白。我还高价买马列原著。我常去高园寺一带旧书店，老板看我不像特务。例如我问他有没有列宁的《宗教与哲学》？他就说你过一礼拜再来。过一礼拜我再去，他准备好了，看到没有别人，就告诉我说，书有了，比原价贵一倍。不便宜呀！我的钱就花在这上面了。我只要能得到好书就行。

我也参加学校里各种活动，像在隅田川河上，班与班比赛划端艇；也滑旱冰，四个轮子的；还有打网球，我都参加。再有军训，用三八式旧枪，上操。东京工大是不上政治课的。要学经济学和工业管理，就有暑假的实习。我去到的是东京一家瓦斯工厂，是立式的炼焦炭炉，烧焦炭煤气，夏天热得很，外面三十六七度，里面40多度。工人工作时是上下脱个光。打一壶水，能一口气喝光。不过他们总是留给我一份。在工厂里，一天补贴6角钱，这在当时是不错了，早饭要5分钱，有一大碗干饭，一点咸菜，一碗酱汤，要是加吃点烤小鱼的话，是7分钱。午饭、晚饭要1角3分钱，如果加饭就1角5分钱。一天6角钱是够吃了。

从技术角度看，我作为白领是不用下炉子去干活的，但实

习就得下去干每一道工序，工作程序是很严格的。有一年，我到东北抚顺煤矿实习，在油母页岩研究室呆了一段时间。那时是1942年夏天，我有一间住房，每天到龙凤井下井工作，一早6点半按时下井。有一天正好组织上找我谈话，从晚上一直谈到夜里2点钟，送人走了我才睡觉，一睁眼就过了6点半了，我急急忙忙拿着饭盒往井口走，迎面许多人，还有担架抬着死人，光光的，只盖一块白布。我知道出事了，到井口梯子前，管井的人告诉我说：“你不要下去了，时间过了，第一班下去的碰上煤气爆炸了，等收拾了，你工程师可以单独下去。”那时煤矿里专有棺材股，他们去收拾那1200多个死人。我幸亏组织来人谈话，躲过了，托马克思的福。当时看见死难家属那种发青灰色的脸面，实在很惨。

我在实习时，那些日本人因为我是工大来的，对我不防备，什么都告诉我，像制造的哪种油是加在坦克里用的等等，我就都记下来，记了一大本子。本来想把资料交给组织上，临到实习结束时，经过办公室主任检查，他一看，是一本子的技术数据，还有军事上用的，他就问我说：“谁跟你谈的这些数据？”我说：“是我学习要用这些数据。”他就说：“你这些不要带出去，没有用。”然后他就用红铅笔划去一些数据，把本子还给我。划去的部分其实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后来我闹了一场肺病，吐血，在二年级时，就被送到镰仓疗养院去疗养。我运气好，本来我家族是有肺病史的，我也病得很重，当时肺病是属于不治之症，但由德语老师给我找好疗养院，一靠空气，二靠营养。我又没有家，老师师母常做好吃的给我吃，我就在疗养院养了一年半，不单养好了身体，还省了麻烦。因为我是地下工作的负责人，特务可能闻到一点，就到公寓去查我，公寓房东看到特务就讨厌，回答说：“米先生得

了肺病，早就死了。”这样，我就没有麻烦了。1942年9月，我乘船经过朝鲜回国了。

钟：您回国几十年后，又和日本打过什么交道吗？

米：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奉命在1973年1月28日赴日本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的新大使馆，作为临时代办，不过一个普通官员。但我一到羽田机场，出乎意料，发现有成千的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和华侨在等候迎接。这样就临时决定围绕机场走一周，以鼓掌致礼答谢。当然这不是为欢迎我这个一介小民，而是对中日复交的庆祝。第二三天的日本各大报都对我有介绍报道。陈楚大使在3月到任后，我在4月初到母校东工大拜会了加藤占美大学长和导师林茂助教授（时年91岁），感谢母校对我培养之情。结果到4月中旬，藏前工业会的事物局长远藤疆特来使馆，他说：因为相互隔绝很久，他们从藏前工业会员名簿上查到我的名字和学科。藏前工业会老一代都是今天日本财经界的巨头，会长大久保谦是三菱电机公司的会长，理事长土光敏夫是东芝电气公司的会长，又是现任经联团的会长。他们要求藏前工业会准备米国均学友来日本的欢迎会，要我考虑好时间通知他，以便准备。我用外交辞令回答：藏前工业会的先辈学友们对我的友情非常感谢。为我的欢迎会不要搞了，大家都很忙，不必给你们添麻烦了。请转达我对大久保和土光敏夫会长的感谢！远藤急了，他说：不行不行，欢迎会一定要搞，大久保和土光敏夫会长交办的事情我一定得办好，否则我交不了差。我等待你回答日期。远藤告辞了，我的心可就七上八下了。

1973年国内的“文革”运动，相当猖狂，江青等“四人帮”在垂死挣扎，气焰嚣张。他们要整周恩来总理和周总理所领导的外交部。而在那个时代每个干部都要交代自己的社会关

系，特别是海外关系。但我从来没有交代过我是藏前工业会的会员。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自然就是藏前工业会的会员。其他的大学也是如此。如同中国的黄埔军校毕业就是黄埔同学会的会员一样。我毕业就离开日本，没考虑这些问题，现在这些忌讳又都找上门来。好不容易在“文革”里挨斗挨整的大难过去了，现在大难又要临头？心里不安，在嘀咕如何处理：如果要报上去，就公开化了，我早年参加了外国团体，又对组织长期“隐瞒”，在“四人帮”看来是罪大恶极了，也是他们难找到的好猎物。有可能被调回，又要到农村长期改造了。我决定对这个欢迎会一定要辞掉。可是远藤先生很热情，每隔一周左右总要来电话催促，他还斩钉截铁说：“大久保谦和土光敏夫会长表示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学友的友谊，一定要办好欢迎会，等候我的答复。”我真的傻了眼了，再也拖不下去了。5月初一个夜晚，我找到陈楚大使，讲了我为难的情绪。他讲：“同日本学友、财界的友好之谊，还是原原本本地报告外交部，由国内来决定吧。”他还逗趣地说：“要调回斗的话，那么再挨几次斗吧。我想有周总理和姬外长是不会的。”没有出5天，国内答复：应该应邀参加日本财经界的藏前工业会的欢迎会。我如释重负。这是周总理和外交部的正确决定。

在5月27日晚6时，我请秘书陪伴参加了藏前工业会在东京都品川区高轮的三菱财团的迎宾馆“开东阁”举行的欢迎会。日方有80多人，都是日本股票二级市场的大公司的董事成员、日本财经界的巨首。会上加藤占美大学长、大久保会长、土光会长等都讲了话，我也作了带有“文革”气味的“八股”答辞。在会上互相进行了学友间的亲切友好的交谈，互相交换了名片，藏前工业会赠送了东工大老前辈日本艺术院奖获得者工艺家各务三以其亲手雕刻的水晶花瓶。会上气氛热情友好，态

度是同学的友谊诚恳。宇部兴业公司的中安闲一对我说：“中日邦交恢复了，这是很重要的。今后中国需要经济建设，要建设没有技术人才不行，中国现在不是技术人才多了，而是缺乏技术人才。你在东京搞一段后，还是早点回国发挥的技术力量，更为重要。其次，在大规模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应避免日本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本来可以避免的，希望不要重演。”

在我临告别时，桌前堆满了这些大老板的名片，都是学友，都是大公司的巨首，我一想到“文革”抄家的行动，心有余悸，下意识地未敢把这些名片拿回来。尽管这是友谊，而且是对国家有用的，当时我脑子里一闪，这是“勾结外国的罪证！”我就忍痛放在桌上而离去。

回来后几天心里没有平静，一是这些同窗友谊难忘，二是翌日日本大报刊又登载了有关欢迎会的报道。第五天日本财界刊物《财界》的封面上刊出我的大幅照片，报道了欢迎会的盛况。这又一度引起了我的不安。后来国内来人告诉我：“老米，行动要注意，使馆有人写你的黑信报告到政治部。”当时“四人帮”的爪牙，就是这样干扰，使你无法正常地开展友好工作！